

記憶與盲點

◎ 劉 旭

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北京：三聯書店，2000）。

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對50篇（部）文革小說進行了結構主義或敘述學的「功能」分層，將之拆解為29個「功能情節」，可謂別有洞天。許子東對文革小說的敘述類型作了深層分析。傷痕與反思小說多是「災難故事」，體現「大眾對文革的集體記憶」，「可讀性最強」，讀者最多，是「臉譜化」的通俗性之作品。反思與傷痕小說中人物的臉譜化，暴露了這類作品的藝術水平不高。臉譜化實際是簡單化，由此一個強大的犯錯集團——大眾——被原諒甚至被美化和迎合。許子東通過分析《芙蓉鎮》來說明大眾的立場：恐怖力量來臨時多是迎合以自保，能做到不助紂為虐的就是「好人」了。大眾群體實際是無原則的，要有也是「自保」。說到底，文革在社會集體意識方面表現為大眾性惡的總暴發。人性中的否定傾向——即否定他人——是無時無處不在的，只是這種心理太過陰暗，大多情況下一般人不敢暴露。因為這種否定傾向的深層心理基礎是嫉妒。這種嫉妒常常以道德規範為工具對嫉妒者實施懲罰。平民由於無錢無權，他們的懲罰（實質是報復）只能通過道德規範來實現，這就是平民的道德規範要比任何時代的法律都要細密得多的主要原因。《芙蓉鎮》胡玉音因為長得漂亮而成為被打擊的目標，就是嫉妒的肆虐。很多情況下，文革的災難是平民道德掩蓋下的嫉妒的大暴發。這時的嫉妒已沒有多少掩蓋物，成為赤裸裸的惡暴露。許子東就論及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被「反革命」化，而且此違反成為反面人物之所以成為反面人物的最重要的一面。最可笑的是馮驥才的《高女人和矮丈夫》中那小市民對高女人的質問：你為甚麼找那麼矮的丈夫？這暴露了平民最恬不知恥的一面。他們的不幸也常常與此相關——他們即使在遭受了無數次這樣的「道德」打擊之後，一旦有了機會，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對別人實施無情的打擊。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稱文革為「公報私仇的大好時機」，他的老婆被別人睡了，他一肚子窩囊氣，想起來就打罵老婆，但當他有機會睡一個胖女人時，他便趁其丈夫不在家將其睡了。這樣的例子恰能說明平民道德的虛偽性，準確一點應是「指他性」，即其他人都該遵守，而本人可以突破規範取得無限好處。功能29的反思但「拒絕懺悔」最能反映這種大眾心理的頑固與強大，犯錯者總能為自己找到「對」的理由，必要時不惜偷換前提。多數文革小說中對文革中錯者的諒解，實際是明顯的扭曲，說到底還是對政治的恐懼，怕過了火再挨一次批鬥，那樣的話，現在的平安和地位又一下子全失去了。倒是文革中肇事者（造反派）事後的報復欲望比較強，仔細分析起來，其不懺悔的背後有政治的強大支撐，造反時有毛澤東做支撐，文革被否定後毛澤東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被否定的是「利用」毛澤東的「壞人」，是以他們腰杆很硬，因為他們沒做過讓毛澤東不「高興」的事。許子東論及《一個紅衛兵的自白》、《血色黃昏》等紅衛兵小說敘述的程式化，先是造反，再是被打倒，最後又能獲救，卻拒不懺悔，這最能體現深層的政治資本優越感和人性黑暗的頑固。

80年代中後期作家筆下的文革已有了另一種不同的面貌。許子東所稱的「荒誕敘述」中對文革的描述已相當冷靜和客觀，這些作家大多出現在1985年之後。這時的文革小說中的人物不再只是可憐兮兮的受害者和訴苦者，小說中的紅衛兵、造反派都比以前清醒得多，知青的面貌也出現了變化，不是說文革中的人突然清醒了，而是作家已在保持距離描寫文革中的完整的人。尤其是年輕一輩作家余華、莫言、葉兆言、馬原等的文革小說，使許子東的好多「功能情節」失效。而且這些作家的視野也開闊起來，除了對文革作真正的反思（如第204頁許子東提到「荒誕敘述」給人的沉重感，一切並未隨文革結束變好，某種程度上還在繼續錯誤），作品中出現了對底層命運的關懷。比如，文革中最悲慘的是那些知青、右派嗎？以前的文革小說和對此的評論都是以知青和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為主的，他們的痛苦被一遍又一遍地渲染、誇大，但作為「勞動人民」、作為對他們進行「再教育」的農民的生活呢？傷痕小說最早出現，反映面極窄，很少涉及農民。反思小說的藝術水準較高，可以張賢亮為代表，他的小說寫到了農民對他的「拯救」，村姑馬櫻花幫他活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但他的反思、訴說、自我暴露的實際動機卻是「自我掩蓋」（王曉明語），他不停地為自己的自私和陰暗尋找理由，也為靠馬櫻花這種「美國飯店」式的反道德人物而活著開脫，有意思的是，他卻不為馬櫻花的違反道德規範尋找理由。他的目標只是為自己辯解，農民只是背景和一個不得不提的敘述「點」而已。馬櫻花還是個聰明的農民，她能靠將自身性符號化換來的物質活下去，其他的農民呢？很少作家真正關心過。這實在是文革小說的一個盲點，甚至在「荒誕敘述」和90年代前期的文學評論中這都是一個盲點。

文革前的大躍進、浮誇風已經刮乾了農民所有的糧食，文革中他們的日子更難捱。余華的《活著》中福貴在文革前為了活命而不得不將啞巴女兒送給無子女的「城裡人」養活。為數不多的反映農民生活的文革小說《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則重點講述了農民糧食被全部剝奪之後的情況，或「犯法」或逃荒。葉兆言1994年完成的通俗偵探小說《走進夜晚》的一個情節很值得深思，文革中村姑戴燕燕特意要嫁給農場的右派馬文，原因是即使是右派也比「領導階級」和「同盟軍」的生活強得多，如戴燕燕為了避免餓死而偷馬文照看的紅芋吃，而馬文雖是要受農民的「再教育」的右派，但他的飯票卻足夠他每天吃飽。陳世旭的《將軍鎮》（1999）中的將軍是個大「反革命」，但他每月有兩百塊錢的工資，這對農民和工人可是不敢想的大數字，他們只能因此對這個「反革命」肅然起敬。「下放」知青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梁曉聲的《泯滅》中的知青有國家補助，節省一點就能保證他們不挨餓。莫言《司令的女人》更提到毛澤東有親筆信下令保證知青的口糧，這並非民間傳說，而是有歷史根據的。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第三卷第五冊記載，福建省一位小學教師李慶霖因做知青的兒子無口糧，遂於1972年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毛澤東的覆信是：「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就此，毛澤東一個批示，知青們就可以整月不幹活也餓不著了，以致知青吃飽了沒事幹專搞破壞，讓農民們大為頭痛，只好把最「壞」的推薦去上大學了事。工人呢？作為「領導階級」，他們身在城市，國家要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以維持城市的安定，陳國凱《我應該怎麼辦》中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能負擔起女主人公和孩子的生活，還能養自己的家。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中普通工人許三觀一家人在文革中為了捱過饑餓，曾一天到晚在牀上躺著——他們至少還能活得下去。而且農民本身也自知比工人地位低，如陳世旭《將軍鎮》中一個農民靠關係在農場看果園，有「工資」，一日被除了名，農村的癩腿未婚妻立刻跟他散了夥，理由很簡單，他又變成了農民。這樣，反革命有工資，右派有補助，知青有口糧，工人至少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農民呢？誰來保障農民？農民成了一切災難的最後承擔者。所有的糧食都來自農民，而在遭受空前破壞之後，糧食已遠不能維持全國人民的生活，基層幹部為了「放衛星」根本不顧農民的死活，上層的實現共產主義

的急切願望又使他們不願面對現實，這就使農民被置於死地。他們只有被餓死，或出去逃荒。一個階層在困難來臨之際連基本生存都不能保證，那麼，他的社會地位如何？《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著實地反映了農民的真正地位。

但是，即使已有作家在有意識地反應底層的真实生存狀態，對於絕大多數的讀者乃至評論家，這仍是一個盲點。知識份子應該首先關注弱勢的。但是，知識份子對農民的感情又怎樣呢？在「重遊故地，感謝苦難」的「功能情節」中，許子東敏銳地指出了已今非昔比的主人公與「人民」之間的巨大鴻溝，他們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拯救過他們的「人民」的生活。他們的「反思」或是事後知識份子的想像，或是為了加上些政治上的生存亮點。許子東在最後引用列寧的一句話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不知道許子東是不是想說：不要忘記過去。因為過去的陰暗並沒有隨歷史消失，它無時不在重演。知識份子首先不應忘記歷史，還應該從自戀中擺脫出來，以有更高的關懷。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0年12月號總第六十二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